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日〕斯波义信 著
方健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日〕斯波义信著
方健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7349-5

I. ①宋… II. ①斯… ②方… ③何…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F12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682 号

书 名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著 者 [日]斯波义信

译 者 方 健 何忠礼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刘风华

装帧设计 陈 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9.875 插页 6

字 数 5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349-5

定 价 53.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序

吴承明

斯波义信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专家之一。1968年他的《宋代商业史研究》问世,一举成名,遂即被译为英文版和中文版。此后20年,斯波先生又在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史著述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巨著。本书视野广阔,广征博考,蔚为大观,而持论极为严谨,凡肯定、不能肯定与怀疑者必详究之。我以“博睿”二字仰先生治学风范,以为本书实为汉学界一代珍葩。而本书的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读之如入百花园中,流连思考而忘返焉。本书在国内已有介绍,史学界并有讨论,惟以文字隔阂,读者未能普遍,早盼有中文版发行。今有方健、何忠礼、李伯重先生合作之译本付梓,实为我史学界值得庆贺之事。斯波先生与我交往有年,今应邀为先生大作中文版作序,深感荣幸。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经济及制度上是古代与近世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期,一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宋代国土日蹙,政治积弱,而经济迅速成长,市场空前繁荣,文化以至科技之昌盛尤引人注目。是以对宋代经济发展程度,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如何,例多考究。评价

高者有宋代“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之说,亦有偏荣一隅、南宋即告衰退之论。

本书对宋代经济各项史实辨证甚详,论其大势,则以为宋之初,江南地区经济尚处于开拓阶段,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即下三角洲)之土地利用仍相当粗放。殆北宋后期,兴起大规模水利工程,于北宋末臻于鼎盛。同时,人口之由长江三角洲北、西、南高地及丘陵地向低湿地、核心地带之移居,亦在北宋末显现成效。核心地带的开发,使江南稻米的平均亩产量显著提高。南宋时期,定居点移动趋势继续进行,江南水利网之格局大体形成,稻田耕作技术有较大改进,但仍有若干粗放耕作地带,江南农田的充分开发,要到明代中叶始告完成。商业方面,北宋中期,商人长距离贩运代替了军事后勤运输,加以城市化兴起,商业发展迅速。国都南迁杭州后,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人口集中,商业鼎盛。大城市中批发、零售以及金融等分业已颇为完整,农村集镇之扩张尤为迅速,已略具明代中叶之规模。惟南宋末,大体在开禧战败后,财政危机加剧,公田法之实施实际上提高了农民负担,江南经济开始步入衰退。

斯波先生一再谦称他的研究是初步的,有些论点是间接证据,有些尚难确证。在本书序章“考察的缘起”节中,他曾将宋代经济成就与16世纪(明代中叶)中国另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相对照。他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确属质的变化,可以确证。农业方面,若水利建设、二熟制之推行、优良作物和相关技术的改进等,宋代已“古典地”完成了。至于宋代与“16世纪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相比,是否匹敌,以及交通、动力源等,尚有待实证云。

以上可见斯波先生立论极其谨慎,并具启迪思考之意,读者寻骥探索,固不必剧作断语也。而我以为更能启发学者,使思路盎然者,乃是本书的方法论。不过,这是我披阅本书后自己的体会,其有违斯波先生本意之处,责自在我。

一 结构主义的历史观

结构主义原属社会学研究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替代了过去线性增长概念。在史学上,经法国年鉴学派倡导,20世纪50年代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大加发展,蔚然成为结构主义历史观。它有总体观察(holistic perspective)和多元时间、多层面分析的特点,适合经济史研究。斯波先生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但并非沿袭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世界”的范本,而是按照宋史的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并有创造。

首先,他在运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并不否定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盛赞并继承前辈历史主义者研究宋史的成果,发扬“博搜史实,积累正确知识”的传统,贯彻实证主义原则,甚至亦不时采用历史主义的叙事手法,因为这种手法适于概括复杂的事实和作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何种历史观,考证和实证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布罗代尔的体系是由长时段的构造史(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心态史)、中时段的动态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短时段的事件史三者构成。布氏认为,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调节,而动态史又受环境的制约,故在研究中有重视长中时段而轻视事件史的倾向(恐怕也有改正传统历史主义专注重于事件的意思)。经济史属中时段史。宋代三百年,自然环境变迁不大,而事件甚繁,如与辽金之和战、厘定赋额(军需)、变法、迁都、引进占城稻、实行经界法和公田法等,都影响经济活动至巨。斯波先生在采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对事件极为重视,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最后,布罗代尔的总体观察是基于他的多元时间论。人是生活在短时段的,生命有限;但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的我”。因此,考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亦应从多元入手,层层相接,以收总体

观察之效。不过,这种方法也常有叠床架屋、卷帙繁浩之虑。本书则是采取斯波先生所称“广义社会史学”的方法,提出从横向、纵向、多方位研究,并根据江南特点,综合出人口、社会流动、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技术要素几个方面,应用有关的社会科学,进行史的分析。他把这种总体观察法形象地称为“人文科学者与社会科学者的学际对话”,这实际是一种新的方法,“有物有则”,并可收以简驭繁之效。

二 区域史理论

区域史研究亦倡自法国年鉴学派,即所谓“空间史学”。然而斯波先生根据中国地理的历史特点,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区域史理论,道前人所未及,实在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首先,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区域观。本书所称“地域偏差”即区域差异,已经超出了地理概念,毋宁说是历史形成的。斯波先生在“地域偏差问题”一节中列举了近 20 位中外学者论述中国区域史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 依人口移动或定居史形成的区域差异;(2) 依土地利用或水利史、农田开发史形成的区域差异;(3) 依社会精英流动或文化生态史形成的区域差异;(4) 依宗法、家族、阶级等社会组织变迁形成的区域差异;(5) 依军事、政治或行政建置史形成的区域差异。以致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中国社会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时间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空间的差异性更大。”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于兹可见。

其次,本书在地理概念上采取了西方学者通用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模型,但是作了修正和补充。他根据江南的开发史,重划其外围边界,调整了域内核心区和边缘地带的结构,重定江南在各大区域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原来施坚雅的区域模型是以地文学(physiography)为基础,以晚清市场分布情况为参照的,因而是一种静态的模型,没有考虑上述多种区域差异的历史因素。宋代的江南,

按照斯波先生的考察,尚属于它周期发展中的“始发阶段”(burgeoning stage),自难适用施氏对长江下游大区的规定性。因此,斯波先生引进了生态系(ecosystem)作为考察的依据,生态系是一个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动态系统。他又参考了已有较详细研究的泰国湄南河水稻田的开发和定居点由山地向中游、下游流域移动的历史,从而把水利史、人口移动、土地开发、文化生态史都纳入他江南区域的研究,这实在是区域史理论的一大创造。

最后,斯波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社会间比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会内比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比较研究,他是按一定的课题,选定可比的社会,从中积累经验的知识,用于整个区域研究。上述泰国湄南河稻作区的例子,即属于社会间比较。而更多的是社会内比较,即书中的个案考察和亚区域考察,几乎占到本书一半篇幅。例如杭州,重点在研究大城市内商业和等级居民形成的功能区划制度;湖州,重点是考察其长期性的生态变迁;徽州,重点在地理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江西袁州,重点在其水利合作组织的兴衰;宁波亚区域,以内外贸易为主;绍兴亚区域,以水利史为主。原来区域史的优势之一就是因为划定空间,可以放长时间,考察多重变迁和长期趋势。本书的个案和亚区域的研究,往往上溯汉唐,下伸至明清,这就给宋代江南的研究增加十分丰富的比较和论证的内容。

三 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研究

传统观点常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线性的,而地区差异乃是发展程度之不同,或是处于线性的不同阶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汉学家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向(trend)是线性的,而发展过程是周期性的,地区差异是结构的不同,并会有相反的运动,如某区是处于其周期的上升期,某区是处于其周期的下降期,这种研究方法称

为“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提出了一篇用这种方法研究的论文,后经修订补充,包括七个大区,于1982年在美国发表。施坚雅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1984年在意大利贝拉丘(Bellagio)召开了以“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斯波义信教授提出了《江南农业与商业变迁》的论文。在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他将该文修正,列入序章“社会之动态”节。

这种周期概念不是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也不同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以创新论为基础的长周期(50~60年),而有点像布罗代尔的长周期(100年)。布罗代尔虽然是考察15~18世纪欧洲,包括地区(国家)差异,但基本上仍属资本主义运动。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周期考察则主要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是10~20世纪。斯波先生在本书中的考察是960~1421年,即宋开国至明永乐初。他划分为七个时段,即:(1) 边境状态(开拓状态);(2) 上升始动期;(3) 上升期;(4) 实质成长期;(5) 下降始动期;(6) 下降期;(7) 上升始动期。这七个时段完成一个400年的大周期。

原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都是采用计量学方法,以见其升降幅度和平衡力量。这在缺乏统计资料的前资本主义时代颇为困难。我看最有成绩者当属厄谢尔(Abbott P. Usher)、埃布尔(Wilhelm Abel)等人利用价格资料所作14~18世纪欧洲农业的研究,明确得出两个下降期和两个上升期、各100年以上的农业周期。他们运用价格资料之技巧,有如化腐朽为神奇。但这是因为欧洲教会庄园的购买、出售、雇工等都逐笔记账,可计出价格。中国没有这种资料,研究者是以人口及赋税为准。人口数不能直接反映经济盛衰,赋税常是定额,且数据不实,以之作计量分析往往不能令人信服。斯波先生在此项研究中,抛开计量主义,采取广义社会史学方法,以土地开发、生态演变、居民移动、商业交通、社会流

动、户籍、税制等作综合考察。而对这些分散的史料,用政治史的创业、中兴、衰亡分期,以政权变动、战争与和议、变法、迁都、建置等系年,则眉目清楚,自成体系,实际上这些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又全文以叙事出之,类《通鉴》笔法,读之引人入胜。

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有无周期,在前述贝拉丘会议上亦有不同意见。盖周期运动必有其所以然的内在规律,此则研究者均未论及,故可不论周期,而称之为阶段。我国学者对于周期论比较生疏,有论者亦限于近代史。不过,历代经济有盛有衰,一地区之兴起常与他地区之衰落并行,则属史实。且不称之为周期,亦应考察其原委。在这种考察中,我以为斯波先生的广义社会史学和以政治史分期系年之法,都是很好的方法,他的上述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例。

以上拙见,不免纰漏,谨借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求教于读者。

中译本序

本书实际上相当于拙撰《宋代商业史研究》(原著,斯波义信,日本风间书房 1968 年版;英译本,伊懋可译,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中译本,庄景辉译,台北县稻禾出版社 1997 年版)的续编。前著对宋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及与此相关的交通、商品市场、城市化、商业组织等方面,就其全局的变化动向进行了鸟瞰,特别着重致力于其事实关系的论证。在这一前著中,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换言之,即为“比较有利的观点”的普及。

为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其先决条件是:经济史家应达成共识,必须共同占有作为这一研究课题基础知识的“地区经济史”方面详尽且正确的资料。为此,本书首先着手对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变化加以考察。以江南为观察焦点的理由,是因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比较丰富而别无其他原因,也丝毫没有江南是代表全中国社会典型的想法。但就经济史层面上对于巨大的中国社会的考察而言,把它视为含有若干独立成长周期的“大地域”的集合,这样的想法比较顺理成

章,符合实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显示一般经济状况的资料,不能不说是
在质、量方面全都极为贫乏。不言而喻,关于公共经济、财政制度政策的
资料已是汗牛充栋、异常丰富。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
是颇具魅力的论题,但笔者认为:冷静地看,我们似有过于匆忙专注于
“国家与社会”这一大题目上之嫌,而尚未达到把共同拥有的基础知识整
理完备的程度。本书还很不成熟,难免有疏误之处,尚未完全逸出习作
的范畴,恳请中国学者对本书的考察及资料的运用等方面给予坦率的批
评,我十分愿意接受各位的指教。

承蒙德高望重的吴承明先生赐以拙著中文本精辟的大序,使我不胜
荣幸和极为感激。本书的中文翻译,承方健先生、李伯重教授、何忠礼教
授、虞云国教授在百忙中费心尽力,字斟句酌,认真详密地译成中文;又
蒙刘东教授的特别关照,江苏人民出版社慨允出版拙著中译本,对此特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波义信

2000.7.20

前 言

拙著《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始刊,1979年再版)的撰写,开始于刚考进东京大学新改制的研究生院之际。这是遵奉导师周藤吉之教授的指示,进行有关宋代商业及其社会实态复原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集中整理有关史料而取得的一项成果。这一时期,周藤先生就《宋史·食货志》各章中与农业有关的全部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译注,通过绵密细致、网罗无遗的一次史料挖掘,对宋代的农业社会史、土地制度及农村统治政策等领域的全貌,在公布其基本事实关系的同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全面的复原,堪称倾全力完成了前人从未涉足的伟业。但从宋代经济史全局的视野来看,还要对流通需求方面进行考察,对必要的基础事实进行详细的研究。导师命我作为研究课题,以此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这一课题所包涵的各种问题,内容十分广泛而又颇具深度,自认为必须倾毕生精力在继续前著的学术路子上深入下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当初研究以来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当时经济地理学范畴的参考成果寥寥无几,与后来相比,在质、量两方面均颇为粗放无序的资料库,有待整理,无论举证方面还是推论方面,均有重加合理且更稳妥概括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这就是拙著刊行以后笔者十分关心的事。

例如,无论从米谷流通的供给和需要两方面来看,还是从农村市场的形成、分化、扩散的过程来看,实际局面在于:随着广搜博采的资料越来越多,呈现头绪纷纭、复杂多样的情况也会愈益清楚;纯经济指标加上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原因,诸如迁都、京畿设定、财政机构及其措施、战乱、灾疫、外交、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移民、技术推广、转移及文化生态条件等各种各样相关的综合实态状况也可辨析明白。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是时代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是空间的差异性更大。另一方面,虽说由于每一地域、地区或时期的特殊状况产生些差异,但就全国、整个时代而言,宏观经济动向的变化和连动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如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的话,那么试问:什么样的变数才是对全体与局部的变化和差异共同起作用的呢?某一地域、地方或某一时期的变化,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表明其是总体的一部分呢?

为了对这种现实的众说纷纭的复合相关方面进行总结性的概括,除了按照差异的原因产生的空间、时间、状况的不同脉络,据资料的证词以求得整合有序外,选定涉及总体与局部的变化全都重要的指标,进行其因果的复合关系的推论,这一程序实有必要。遗憾的是,伴随这种视野的研究还停留在萌芽状态。例如,以国家的农政、财政为主,即使是关于土地制度、财产制度、行会、币制等等与公私制度范畴有关的研究,也多半是反映所依据资料性质的法制史、制度史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能得到反映国家水平的观点及整个时代特色的重点所在。即使参照宏观经济态势发展模式关于经济增长的推论,也未必会被解释错综复杂相关实际状况的中等水平的理论所认可。

宋代经济的、社会方面的各种变化,对延续千年之久的元、明、清的发展留下较大的影响,这是难以抹杀的事实,尽管残存的资料存在明显的失误及杂乱无序,作出这样的概括仍未免牵强和困难重重。即使看来也好像颇为繁杂,但把有限的资料置于比较恰当的位置,选出适当的指标,必须有史料学上的积累才能提供个别与全体关系一望而知的推论。

利用局部事例研究和地域史研究的手法,只要得到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的证实,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本书是把考察局限于长江下游流域的一个具体事例及局部地域的研究,观察对象既不是一个小地区,也不是全国范围,而是介于两者中间水平的、国家与社会的相接地域及其历史。之所以选择江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固然是因为资料遗存状况比较好,另一原因是江南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远远压倒其他地域。但我并不认为江南的事例是宋代经济的典型,这也可以说是积累其他地域的事例研究,以达到解析总体全貌程度的一种过程性的尝试。以其与社会总体的联系作为测定地域发展的指标,主要有人口密度、村落分布、农作物分布、城市化发展水平、技术要素(交通、水利、农耕法、手工业等)及社会流动性等。以这些为焦点,应尽可能抓住接近具体实态的相关指标,但坦率地说,这些也都未必能达到足以彻底分析的程度。

本书尚有欠成熟,如有内容上的失当,责任概由笔者个人承担。在研究的过程中,深受诸多前辈时贤学术成果的启示和教益,仅表不胜感谢之意。在研究生院期间,承蒙得到导师周藤吉之、松本善海、西嶋定生、山本达郎、榎一雄诸位教授的悉心教导,正是他们指示我在研究商业史的同时应探索经济的地域差异问题,这些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作为东洋文库的研究生提出的报告,这一论述地域差别的论文最初承蒙榎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予以勉励并加推荐。

当时,因为经济地理的考察和分析在日本国内还很罕见,势必通过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西欧的地域史、年鉴学派的学说及美国的地域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史料学方面的教示中获益匪浅。1950年代以来,作为西欧的汉学家先驱杜熙德(Dennis Twitchett)教授,在其论著中一贯主张地域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当我拜读其大著见到这一真知灼见时,无异在黑夜中见到了光明。不久,经过杜熙德教授的斡旋,仰赖斯坦福大学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指导,又得

到市古宙三教授、马里乌斯·杰森(Marius Jansen)教授的援助,得以远渡重洋,赴美访学。此后,近20年来,承蒙施坚雅教授地域社会分析法的启蒙,才得以初步入门,有幸数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讨论,同时拙文也承施坚雅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赐予刊载的机会,这些在笔者的研究生涯中均是难以忘怀的隆情高谊。

在当时欧美学术潮流中,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其间倡导“新社会史”观理论,重视整体史观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ty)理论;选择问题史学的论题,以及开拓社会史的学术领域、与地域史的细密研究相结合,即通过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间的学际对话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和方向。所以,欧美学术潮流对本书的研究大有裨益。学习宋代政治社会史学家刘子健教授关于决定统治阶层行动类型的各种各样社会要因的复合性的理论,及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关于同时说明社会经济的进化与均衡的理论手法,使我从中得到最为新鲜可贵的启示。我也从马若孟(Roman H. Myers)博士那里学习分析农业社会的方法,同时还在从新古典学派那里学习关于“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各种理论的过程中,把这些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1975—1976年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作访问学者的一年间,当时承蒙施坚雅教授及马若孟博士对笔者的“宁绍地域史”研究予以极大的鼓励和帮助,能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明清时期资料的收集。然而在本书里这一成果就尚未达到系统整理、公之于众的水平。相对于两位的关心,拙著实在是名不副实,笔者惶恐不已。

近10年来,欧美的汉学家不断刊出地域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的论著,本书也从中深受教益,尤其是从何炳棣教授的人口史、移民史、社会流动史研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的明清地域研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关于宋代开封经济圈、人口及社会流动的地域研究,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教授关于宋至明代的徽州研究,曼素珊(Susan Mann)教授的清末厘金研究,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的明